

《山本》与《长河》中的女性形象对比探究

陈添忆

(山西大学)

摘要：贾平凹的小说《山本》与沈从文的小说《长河》在相似的地方题材类型下分别塑造出以陆菊人与夭夭为代表的女性形象。地域特色、人文精神、宗教信仰、男女关系等要素同样为两部作品的女性形象塑造提供了可切入的角度。虽然贾平凹在文学创作上对沈从文有所继承，二者立都足故乡进行乡土文学的创作，塑造的角色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点，也在一些角度因地域而呈现出差别。本文旨在分析对比《山本》与《长河》中的女性形象，对贾平凹与沈从文的作品比较做出补充。

关键词：贾平凹；沈从文；《山本》；《长河》；女性形象

贾平凹与沈从文同为中国乡土文学的杰出代表，其创作基于各自的故乡，分别体现商洛与湘西世界的风貌，二者的创作在乡土情结、审美追求以及价值取向上具有明显的传承、发展关系[1]。商州是对湘西的映现与承续，这两个世界在文化内核与风土人情上的异同在人物形象上得到反映。二位作家在自己描绘乡土风情的作品《山本》与《长河》中，各自创造出了具有代表性的女性角色。

一、女性特质的聚集与分散

《山本》与《长河》创作上的相似之处体现在对女性形象的勾画上。在《山本》的陆菊人等与《长河》之中以夭夭为代表的女性角色身上，同样呈现出乡村女性的美好特质：质朴、温和，勤劳善良，亲近自然，虽所处的社会角色与年龄阶段不同，但对生活同样具有自己的态度与智慧，体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作者将自己观念中乡村女性所具备的美好特质汇总起来赋与笔下的女性，使之成为其所处的乡土社会中近乎完美的角色偶像。《山本》中的女性形象身上集中体现出传统社会里的女性所拥有的美好品性，如陆菊人的贤惠能干，花生的美丽温顺等；《长河》中的夭夭身上，则呈现出活泼大方、骄傲善良的特点。作者在进行这些形象的创作时，都参考并提炼了当地人文风情中具有代表性的女性特质。

二者对理想形象塑造手法的区别主要在于，《山本》的

陆菊人身上，女性特质的体现更密集而具个人色彩，《长河》的诸多女性身上，则分散地体现出了一整片湘西土地上女性广泛的特质，个人色彩有所弱化。在进行陆菊人的角色设置时，贾平凹广博采集了多种人物样本，主要以安吴寡妇周莹为原型，同时融入作者本家三婶的影子，“明事理，主意笃定，气质非凡”。这些特质经过艺术加工，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得到体现。总之，贾平凹将某一女性群体的形象特质集中到一个具体的角色即陆菊人身上，使之成为作者心目中完美女性特质的载体。这样的角色设置使单人形象更加突出，但书中的其他女角色如宽展师父、花生等，则几乎都不具备像陆菊人这样鲜明的形象，只以浅淡的笔墨刻画其性格之中的某一侧面，这种刻画也多为塑造陆菊人的形象而服务，在其余方面则着墨较少。《长河》中，沈从文将某一种女性特质分散至女性整体，再从女性整体中选取一两位有名有姓者进行描述。夭夭是作者从湘西世界中灵巧聪慧的少女形象中挑选出来的代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虽然不同少女形象之间有细微的差别，但大多数女性形象在这种分散下造就的共性之中依然显得朦胧，个人特色并不突出。

二、自然品格的凝固与流淌

两本书中的女性形象都体现出其所处时空的自然品格。商州的描摹具有湘西的映现，贾平凹在建构商洛世界时从沈

从文对湘西的描绘之中吸收了养分,以当地的自然风物为基础展开故事。这种延续同样反映到女性形象的塑造上,最为鲜明的即自然品格在人物身上的映射。从起名到人物形象细节的描写,两位作家都广泛运用自然风物以隐喻。两本书中的女性角色因其身上展露的自然品格,在某些时候与自然融为一体。《山本》中作者多次以自然事物暗示人物命运,从角色的名字如“陆菊人”、“花生”(前者以菊花为名,暗喻陆菊人高洁的精神世界;后者指少女拥有花般生命,花生也从侧面映衬陆菊人的形象,二者共同构成作者心目中完美女性的一体两面)到对话细节,无不体现出与自然的紧密连结,甚至有些时候角色直接成为自然化身。如小说结尾,陆菊人与陈先生的问答道出“涡镇成一堆尘土也就是秦岭上的一堆尘土”,陆菊人在对话中是涡镇命运的见证者,历史的目击者和当事人[2],呈现秦岭般的旁观态度。《长河》中,以夭夭为代表的年轻女孩灵巧开朗、天真善良,是湘西自然山水精魄在人身上的投射。沈从文描述书中的角色尤其喜欢以灵动的自然造物比喻,如小说中对夭夭三姐妹的描述:“三个女儿就同三朵花一样,在阳光雨露中发育开放。”在对角色的外貌与性格作描写的同时间或穿插对景物的描写,同样暗示角色与自然密不可分的联系。

由于所处地域不同,两部作品中的女性角色身上的自然品格也有所差异。比较商洛与湘西世界的自然情貌,可以发现商州依托秦岭兴起,在风土人情上也体现出秦岭的品格,像秦岭一样深厚、稳健,相对而言凝固与静止;湘西生于湘水,其间的人物品性也流露出湘水的格调,活泼、潇洒,像长河一般绵延流淌。除了上文提到的借名字得到暗示的秦岭草木的特质外,商洛世界中还有一种不可忽视的自然品格,即土地的仁厚安定。最明确地继承了这一品格的角色是宽展师父,她在小说中的出场,数次明确地与地藏菩萨联系在一起,甚至直接通过其余角色之口写出这一角色与菩萨的关系,而地藏菩萨正是“安忍如地、代众生苦”的土地精神的代表[3]。这些安定的女性角色与秦岭之间草木土地的联系比时刻运动的、甚至在有些时候显得浮躁的以井宗秀为代表的男性角色要更紧密,与秦岭的地域内涵暗合。虽然最后井宗秀在失败中走向死亡,陆菊人的生命却依然强健而平缓地向前行进,宛如恒久存在的秦岭土地。至于《长河》,其展现的世界如河水灵秀轻盈,人物特质也自然随之变化。作者在刻画人物时所运用的比喻与长河世界中的风物契合,同时运

用与描摹自然风光时相同的笔调,活泼清新、兼有自然气质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此外,作者在许多地方都提到当地人的生活与自然不可分割。在小说开头的《人与地》一节中,就首先写到当地的大多数女子需要的“是与日常生活有关系的常识和信仰,……对于儿女的寿夭,尚完全付之于自然淘汰”,体现出依托湘西的山水天地而萌发出的顺应自然规律的天然秉性。当地人需要的知识密切地关系着自然,自然品格无处不在地融入他们的生活中。

三、角色天性的收束与解放

“自然”虽然是湘西世界与商州世界得以建立的至关重要的依托,却依然是由人构成的社会,角色特性不能避免地受到社会运行的潜在规则的影响与制约,其行事风格与人物个性都受到这种规则的引导,使自己的天性与普遍的社会性融合在一起,体现到举止言行上。在角色天性的规训上,商洛世界更加收束,湘西世界则更解放。其异同可从两性关系与宗教信仰的侧面切入。

两部小说中,社会公德对两性关系同样作出要求。无论是《山本》中陆菊人在与井宗秀产生了复杂的暧昧情愫后却“止乎礼”,还是《长河》的《人与地》一节中提到的受引诱私奔怀孕,被发现后不得不自尽或沉湖的女子,她们的天性或主动、或被动地为社会公德的规范所约束。二者的区别在于,比之湘西,商洛社会受佛教观念与儒家道统思想约束更深重。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诞生出的女性角色,身上必有更深的传统社会文化的烙印。而湘西社会的运行规则之中,这种传统道德准则的规训较少。因此,作为符合传统男权社会下诞生的儒家道统观念的审美,“按照男性中心话语塑造出来的一个女性”[4],陆菊人将私人情感转化为更加深沉的大爱,亲自为井宗秀挑选培养妻子花生,花生的美丽与被陆菊人亲自教导出的温柔贤惠更是男权社会的催生物[5],在这样的社会当中,“女性习惯上被看作是男性所不允许成为的所有人,男性被看作是女性所不能够成为的人”[6],即便是陆菊人这样的优秀女性,也同样需要为井宗秀等男人的事业与生活服务。这种由私人的复杂情感向无私的“大爱”的转变,显然并非能由人的天性驱动,而是受到社会礼法下二人身份及与之相伴产生的强烈道德感的约束而达成的。《长河》的湘西世界中的道统思想不如前者明显,故其中角色的天性比起前者也得到较多解放,在两性关系上就显得轻松,男女爱情的生发也更加自由。例如面对父亲拿婚嫁之事打趣,夭夭

虽然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但并不对此因受制于礼法而讳莫如深，家人与亲朋也并不以此为尴尬之事，当地的风俗也对恋爱的发生有所鼓励。贯穿《边城》始终的青年男女以歌相答、因歌定情的传统，同样在《长河》中有所体现，展现出浪漫轻松的图景。

宗教信仰在两地居民的生活中不可或缺。商州世界的宗教观念融入角色，湘西世界的宗教活动则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山本》中陆菊人与宽展师父同佛教紧密相连，前者是地藏菩萨精神的托寓，直接通过井宗秀在一瞬间将陆菊人错看成地藏菩萨以明示；后者是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自我牺牲精神的象征。《长河》中对于神佛的信仰固然存在，其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很轻松，并不严格约束，而成为当地女子排遣情感与消减疲惫的生活方式。湘西世界中的宗教观念与沈从文本人的创作理念是契合的：其创作的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所表现的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7]。

四、价值开拓的实践与想象

在《山本》与《长河》这两本书中，面对女性的生存与价值空间——想做什么、能做什么、做到多少，及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与碰撞——作家给出了自己的思考。最大的共同点是陆菊人和天天身上都呈现出自我意识的萌芽。面对自己的人生，陆菊人在一定限度内突破了时代局限性，初步具备了现代意识：年幼时就敢于对在封建社会的家庭中被视为绝对权威的父亲作“我去了就绝不回来”的反抗；结婚后并不恪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观念，而是跳出婚姻对传统女性的拘束，对自我具有了知觉。《长河》中，面对队长与师爷，天天并不逆来顺受地以被凝视的客体承受轻佻的言语，反因感到侮辱而跑走。在队长准备追过来时，跳出狂吠的白狗也可看作天天心境的外化显现。

价值开拓上，二者较为鲜明的区别在于陆菊人极大地将自己开拓价值空间的想法付诸实践，天天则更多地停留在初始的萌芽阶段。陆菊人在“实现理想”上表现出了更多的主动性，从她试图要回自己陪嫁的胭脂地，到发现无法要回后决心帮助井宗秀，并在丧夫后独立支持起自己的家庭，甚至还推动满镇向前走去，即使遭遇许多现实困顿，陆菊人对自身生存与价值空间的开拓贯穿始终。某种程度上，《山本》其书记录了陆菊人开拓价值空间的轨迹。除了己身的穷达得

失，作者将陆菊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提到大爱的高度，这种价值空间的拓宽借由宽展师傅的引导，无限趋近于前文提到的地藏菩萨精神的托寓。由陆菊人不论对象一视同仁地为死者超度、树牌子的情节，可见其价值空间之宽阔。

在沈从文轻松闲适的叙述口吻下，比起陆菊人，生活环境放松的天天对自身价值空间的拓宽就不甚鲜明，价值空间也较狭窄。但选择在当地社会较优越的师范学生作为缔结婚姻的对象，同样可以作为价值空间的评判标准。除天天外，小说中也提到其他女孩的去向，有些家庭环境较优渥的女孩得以走出农村，进入城市读书，甚至像男子那样教书挣钱，赚得不菲的薪水，可视为当地女性基本自我价值意识萌芽并取得的初步成果。另外，纵向比较沈从文其他作品中的角色如《边城》的翠翠，天天面对自己的生活仍是有想法的，即使并未得到实践，依然可将其看作拓宽自身价值空间的潜在可能性。

作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山本》与《长河》通过塑造陆菊人与天天等文学典型，展现了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的风土人情。从女性形象的差异能管窥商洛世界与湘西世界从自然风貌到精神内核的区别，是对地方书写特色探索的补充；这种区别反诸角色之身，则更丰满了角色特质，为读者留下无限想象。

参考文献：

- [1]白忠德.乡土文学视角下贾平凹对沈从文的借鉴分析[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7, 30(5): 5.
- [2]孟繁华.秦岭传奇与历史的幽灵化——评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J].当代作家评论, 2018(4): 4.
- [3]张志刚.从地藏菩萨的大愿谈佛教中国化的内涵——以赵朴老“九华山一席谈”为中心[J].法音, 2021(12): 2.
- [4]江腊生.回归中国叙事传统的诸种可能——论小说《山本》的文化追求[J].文学评论, 2018(6): 8.
- [5]任荣娟.花生有情难结果——解读《山本》中女配角花生形象[J].安康学院学报, 2019, 31(5): 4.
- [6]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M].2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30
- [7]朱建宏.湘西世界与沈从文文学想象探析[J].名作欣赏, 2023(8): 158.